

# 從胡譜到姚譜： 近代第一本域內章譜的問世及其後史

王信凱\*

## 一、序 說

「章學誠(1738-1801)」的大名，在民國初年的時候，躍上現代學術舞台；而胡適(1891-1962)撰述的《章學誠先生年譜》，被視為是在中國域內點燃這股學術之火的先驅<sup>1</sup>。

然而，胡適撰述《章實齋先生年譜》的心路歷程，直接涉及二十世紀初中國域內的學術文化圈，與域外的國際漢學場域。胡適的撰述動機與實際著手進行的情況，究竟如何呢？起初的撰述動機與設想，往往會在不斷深入、發展、浮現的資料中，產生許多無法預料的狀況。是故，從著手開始到初步完成的歷程，彷彿是一場艱苦的冒險行動。

胡適撰述《章實齋先生年譜》，亦復如是。作為一位現代章學誠學研究的開拓者，胡適並不孤單。在中國境外，有日本學者內藤湖南(1866-1934)；在中國境內，也有著名的學者如沈曾植(1850-1927)、孫德謙(1873-1935)、梁啟超(1873-1929)、張爾田(1874-1945)、劉承幹(1882-1963)、何炳松(1890-1946)等，與許

---

\*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研究部博士生

<sup>1</sup> 杜維運，《清代的史學和史家》(台北：東大圖書公司，1984)，頁 367；張愛芳，〈論胡適章實齋先生年譜的學術價值〉，《浙江學刊》，2000.1(杭州，2000.1)，頁 130-135；張愛芳，〈論胡適章實齋先生年譜的特點及影響〉，《淮陰師範學院學報(哲學社會科學版)》，2005.4(淮安，2005.7)，頁 496。

多不知名散布各地的競爭者，構成著一個潛在的研究互動網絡。表面上，具體的研究成果，先後體現於日本、中國出版的《章實齋先生年譜》；不過實際上，所謂的年譜撰述背後，則直接牽涉於「章氏遺書」的資料收集，這是二十世紀初期的章學研究發展中，境內也好、境外也罷，所有老的、少的、新的、舊的研究者，都必須面對的一種根本現實問題。因此，要具體瞭解胡適的心路歷程，必須扣緊此問題，討論撰述歷程中，跟各競爭者對話與交鋒的應對進退。

另一方面，從一九二二年二月，胡適的《章實齋先生年譜》正式出版後，「胡譜」便在二十世紀的章學研究史上，奠下重要豐碑<sup>2</sup>。然而，八十多年來坊間不斷再版的胡適《章實齋先生年譜》，實有根本的身份辨識問題，即：一九二二年胡適的「初撰本」與一九三一年的「訂補本」，在譜之封面上雖直接署名胡適撰，但實各有不同的身世<sup>3</sup>。而此所涉入的，便是一九二二年「胡譜」撰成後的「後史」發展。究竟「訂補本」與「初撰本」有何差別呢？照理說，「訂補本」應比「初撰本」好上許多，因為後來陸續增加的資料條件及各種相繼問世的研究成果，有助於針對原書錯誤或未盡良善的地方，進行修訂增補。而在後世流傳的現象上，「訂補本」確實在這合理的認識下，成為人們的認識基礎。然而，在一九五〇年代時，寓居香港的吳天任(1916-)，卻曾經提出一個令人匪疑所思的說法，他認為：「訂補本」較之「初撰本」錯誤更多<sup>4</sup>。這個說法十分具爆炸性，因為顛覆了一般的認識。若是如此，那號稱「完備」的訂補本，在後世廣為流傳的意義上，就蒙上了一層陰影了。吳氏大概是極少數有對「初撰本」和「訂補本」進行仔細對勘的研究者。他認為，惟有通過對勘，才能知道「訂補本」中，哪些是原來的，哪些是姚名達(1905-1942)後來增訂的。利用這個對勘研究基礎，吳氏曾針對「訂補本」，寫了一篇長達四十六頁的商榷文字，鉅細靡遺地列舉了許多錯誤<sup>5</sup>。然而對於為何「訂補」的會比「初撰」

<sup>2</sup> 胡適，《章實齋先生年譜》(上海：商務印書館，1922)。

<sup>3</sup> 胡適(著)，姚名達(訂補)，《章實齋先生年譜(訂補本)》(上海：商務印書館，1931)。

<sup>4</sup> 吳天任，〈胡著姚訂章實齋年譜商榷〉，《章實齋的史學》(香港：東南書局，1958)，頁 250。

<sup>5</sup> 吳天任，〈胡著姚訂章實齋年譜商榷〉，《章實齋的史學》，頁 250-296。

的錯漏更多？這樣一個十分關鍵的問題，他並沒有辦法回答。而另一個問題的出現，使得他更摸不著頭緒，就是在閱讀了姚名達自撰的《章實齋先生年譜》後<sup>6</sup>，發現其「雖然簡略，體例卻頗精嚴」，而且「姚譜有許多事迹年月，都和合譜(訂補本)不同<sup>7</sup>」。對吳天任而言，他似乎無法理解姚氏在訂補和自撰上的人格分裂，甚至有點動了氣地在文中質疑：「難道這也是『絕對不說一句話』嗎？抑是胡氏意思不容更改的呢<sup>8</sup>？」至此，吳氏仍無法理解原由何在。理解學術大多會針對個人個別的意識，進行區分，而要據此討論訂補「治兩者意識為一爐」的現象，顯然就未必如此簡單。不過，倘若置換思考視野，學術中「人」的歷程，無疑是相當重要的；要不，在歷史研究就無法更深入地探討其「原本構想」的「生活空間」；無法去體會其生活中的「人情交往」。著作總是以「書」的形式傳世，但「書」的實際狀態到底是指「書」還是指「人」呢？「書」能夠保留「人」的生命軌跡嗎？這是一個十分值得關注的問題。

然而，究竟從一九二二年初撰本正式出版後，到一九三一年訂補本問世，的這一段時間，發生了什麼樣的事呢？此即本文所謂的「後史」發展，所以針對「從胡譜到姚譜」進行剖析，便是全文探討的主軸與脈絡，兼涉其他相關的人事物。胡氏與內藤湖南、劉承幹、姚名達等人，互相在撰譜、訂譜過程中的交往，所反映的不僅是二十世紀章學研究興起之一幕，亦是二十世紀二、三十年代中國學術文化圈中「以書窺人」的實例。本文將從胡氏撰譜之源入手，具體呈現其心路歷程及關鍵動因；進而，再透過對「初撰本」與「訂補本」的基本對勘，輔以內藤譜、姚譜(姚氏自撰譜)，設法瞭解後來訂補的一些基本狀況；最後，以胡適與姚名達在當時學術文化圈實際的交往歷程、觀念看法和現實生命軌跡，來總述這段「後史」。

<sup>6</sup> 姚名達，〈會稽章實齋先生年譜〉，《國學月報》，2：4(北京，1927.4)，頁185-211。

<sup>7</sup> 所謂「合譜」是吳氏的簡稱，括號乃筆者所加。參吳天任，〈胡著姚訂章實齋年譜商榷〉，《章實齋的史學》，頁250。

<sup>8</sup> 吳天任，〈胡著姚訂章實齋年譜商榷〉，《章實齋的史學》，頁251。

## 二、「章氏遺書」與胡適撰譜

要討論所謂「後史」，亦要先對「前史」有基本的瞭解。那胡適為何要撰寫《章實齋先生年譜》呢？胡適一九二二年一月二十一日在上海大東旅社為《章實齋先生年譜》所寫的〈序言〉中，一開頭就談及撰寫年譜之動機：是由於一九二〇年冬天讀到，在日本《支那學》第一卷第三號至第四號連載，由京都大學著名學者內藤湖南撰述的《章實齋先生年譜》<sup>10</sup>。

事實上，胡適初讀時的靈機一動與後來成書出版寫序時的回顧，發展並不相同；因為一開始胡適並沒有想到自己後來也會寫出一本年譜，這只是出自於他在留美生涯中培養的一種習慣：對於外國漢學家的研究進行批評，是他在留學歷程中體悟出的一種應對方式<sup>11</sup>。而從很早開始，胡適就有成為國際漢學界學術「糾察員」的想法<sup>12</sup>，所以在《章實齋先生年譜》的〈序言〉中，也有相關思考引發的反思，他說：「最可使我們慚愧的，是第一次作《章實齋年譜》的乃是一位外國學者<sup>13</sup>」。其中的「第一次」與「外國學者」的用詞，對於胡適而言，頗可玩味，這是一個充滿企圖的情境。他曾在一九二一年九月五日對

<sup>9</sup> 筆者於此未標為書名號，乃是對於「章氏遺書」的嚴肅思考，書名取自後世的蒐羅編輯，所名為「遺書」，乃意「未全」，所以「章氏遺書」便構成了一個學術追尋的命題，各家出版的「章氏遺書」，實則皆不足以全稱之。「章氏遺書」長時間隱含著未完成之意。從大陸 1986 年文物出版社出版《章學誠遺書》之前的「遺書」來看，「未完成」的現象，是我們要關注的核心。甚至連 1986 年版都還未得以「全稱」之。參倉修良，〈整理《文史通義新編》的幾點想法〉，《史家·史籍·史學》（濟南：山東教育出版社，2000），頁 500。而近來倉氏又有所謂「新編」出版。參倉修良編，《文史通義新編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3）。2005 年倉修良又依「新編」基礎，另加修補，出版「新編新注」。參倉修良編，《文史通義新編新注》（杭州：浙江古籍出版社，2005）。

<sup>10</sup> 胡適，〈胡序〉，《章實齋先生年譜》，頁 1。

<sup>11</sup> 「胡適留學日記」1914 年 6 月 2 日有「大英百科全書誤解吾國紀元」條、1914 年 8 月 2 日，有「解兒司誤讀漢文」條。本文統一引用曹伯言整理的《胡適日記全編》。參胡適（著），曹伯言（整理），《胡適日記全編》，第 1 冊（合肥：安徽教育出版社，2001），頁 288；402。而 1915 年 2 月 11 日，有「西方學者勇於改過」一條。參胡適（著），曹伯言（整理），《胡適日記全編》，第 2 冊，頁 48。

<sup>12</sup> 不過窮其一生，胡適都沒有能夠完成這個志願，然而這個志願後來由其學生楊聯陞達成。

<sup>13</sup> 胡適，〈胡序〉，《章實齋先生年譜》，頁 1。

自己期許：「在大家不做事的時候做一件事<sup>14</sup>」。然而，這次對內藤著作的糾察工作，與之前在美國針對英美漢學家的狀況，不太一樣，這是胡適首次與日本學者交手。英美漢學家研究的問題所在，大多存在著對於漢籍解讀的謬誤，只要針對這些錯誤加以針砭，並更正即可；而日本學者的狀況卻不盡相同，由於東亞文化傳統的關係，雖然語言不同，但對漢籍閱讀的基本熟習程度並沒有太大差異。所以胡適的「糾察」行動，就不是簡單的「訂補」可以解決的，加上內藤撰述的是一部具中國傳統體裁的「年譜」。撰寫「年譜」必須對於譜主生平與學說，有詳細的掌握；不過要掌握，則必須對於譜主一生遺留的已出版、未出版的文字，有最完整的收集。所以內藤手中使用的「十八冊章氏遺書」鈔本，正是胡適想要「訂補」，面對的最大挑戰<sup>15</sup>。

胡適在一九二二年《章實齋先生年譜》〈自序〉中所說的故事，與不斷發展的歷程有些微的次序失真<sup>16</sup>。不過，這並不是刻意的掩飾，只是突顯了不斷發展中許多無法預料的狀況。當時中國境內也同時存在著其他正在進行的「章學誠研究活動」。所以胡適對資料的判斷，也隨之不斷修正。從最初的「校讀訂補」，到決定開始撰寫一部新的《章實齋先生年譜》，主要的轉折是由於，在青木正兒(1887-1964)幫忙得到內藤藏本的〈目錄〉前，浙江圖書館出版了一本全新排印的「章氏遺書」；經比較後，胡適認為與內藤「所差極少」，並又發現不少錯誤<sup>17</sup>。在「構想」上：若是一方面校補內藤之缺，另一方面再發撰

<sup>14</sup> 「胡適日記」1921年9月5日條下有：「凡今日享一點名譽的人；都是在大家不做事的時候做了一件事的」。胡適自己還在這句話上，特別加上評點符號。參胡適(著)，曹伯言(整理)，《胡適日記全編》，第3冊，頁460。

<sup>15</sup> 內藤湖南，〈章實齋先生年譜〉，《支那學》，1：3(京都，1920.11)，頁14-24；1：4(京都，1920.12)頁44-52。

<sup>16</sup> 這裡指的是胡適在〈自序〉裡說的：「我讀內藤先生作的《年譜》，知道他藏有一部鈔本《章氏遺書》十八冊，又承我的朋友青木正兒先生替我把這部《遺書》的目錄全鈔寄來。那時我本想借鈔這部《遺書》，忽然聽說浙江圖書館已把一部抄本的《章氏遺書》排印出來了，我把這部《遺書》讀完之後，知道內藤先生用的年譜材料大概在這部書裡面」。參胡適，〈自序〉，《章實齋先生年譜》，頁1。不過對於這裡的「次序失真」，將在後文中討論。

<sup>17</sup> 1921年2月4日胡適致青木正兒信，說他用《中國學報》上刊出的章氏遺文〈《史籍考》目〉、〈《史籍考》序例〉來改正內藤《譜》的幾個錯誤。參耿雲志(編)，〈關於胡適與青木正兒的往來書信〉，《胡適研究叢刊(第一輯)》(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1995)，頁318。另關於胡適

新體例，寫成一本全新的「年譜」，那他在本國境內便可真正完成一件「別人未曾做過的事」。這是一股十分大膽且有勇氣的氣魄。於是，他果決地展開計畫，時間大約是在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之間<sup>18</sup>。但在《胡適日記》的記載中，胡適撰寫《章實齋先生年譜》的記錄，最早出現在一九二一年五月六日條下：「補作《章實齋先生年譜》，未成<sup>19</sup>」。「補作」二字，可知早已展開，而《日記》最後的記錄是在一九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條下：「作《章實齋年譜》的自序，未成<sup>20</sup>」，此時年譜已經完成。後來，〈自序〉一直到一九二二年一月二十一日在上海大東旅館才正式寫成，不過此事並不記載於《日記》中(1922年的《日記》從2月4日開始記起)。另有一點值得注意：「章氏遺書」的形成，在清中葉以來迄民初，一直爭議不斷，「遺書」顯示的意義，實乃後世眾好事者蒐羅章氏生前遺留著作的競爭。而各家所統稱的「章氏遺書」，嚴格講起來，都不是「全」的。種種版本、篇目……等問題，纏起百端苦思，未得一解。故，競爭中，不是最聰明的人注定勝利，也不是最努力的人決定結果，發展結果往往難以想象；因為未經親手閱覽就無從「截斷眾語」。但「新版本」何時出現？努力之外，總還要運氣來加分。而一旦擁有新資料，「發言權」總是要搶先的。所以討論「胡適撰譜」的心路歷程，關鍵問題就是：從「內藤藏的『章氏遺書』十八冊」展開的，一系列資料尋找的競爭行動。

---

與青木正兒往來書信，則以耿雲志所編最為完整，他將《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》中的青木來函與日本青木家屬存留的胡適致青木函，合為全璧。1999年李慶(編注)的《東瀛遺墨：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稀見史料輯注》一書也收有「胡適致青木正兒的信(1920-1921)」九封，據編輯說明乃家屬提供，對照耿雲志所編完全相同，但耿氏早於1995年已經刊出，李慶編注的已重出。參李慶(編注)，《東瀛遺墨：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稀見史料輯注》(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99)，頁174-189。

18 「青木函」1921年1月27日，有詢問胡適是否收到「章氏遺書目錄」一事，依照胡適同年1月24日所寫給青木的信的時程推斷，胡適大約是在24-27日間收到目錄的。參耿雲志(編)，〈關於胡適與青木正兒的往來書信〉，《胡適研究叢刊(第一輯)》，頁316。

19 胡適(著)，曹伯言(整理)，《胡適日記全編》，第3冊，頁245。

20 胡適(著)，曹伯言(整理)，《胡適日記全編》，第3冊，頁507。而1921年10月27日，日記有：「補《章實齋年譜》一段，全稿約四萬五千字」，可知當日已經完成。參胡適(著)，曹伯言(整理)，《胡適日記全編》，第3冊，頁506。

### 1. 內藤藏「章氏遺書」鈔本

胡適為何會認識青木呢？主要因為青木仰慕胡適作為中國「文學革命」推動者，對其主張「觀察」與「方法」兩方面，必須自西洋文藝借來建設自己的傳統，這樣的理念，很嚮往<sup>21</sup>。他特別在《支那學》創刊號撰寫了一篇〈以胡適為中心的文學革命〉，連載三期。之後青木並以撰述者與刊物發起人身份，與胡適展開了一場學術因緣。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十四日，胡適看完青木正兒寄贈的《支那學》第三、四期，致信感謝，曾談到「十八冊遺書」事。胡適表示，自己很愛讀章學誠的著作，但所收集的十分有限。得知內藤藏有「鈔本《章氏遺書》十八冊」，十分驚喜，引起了他的「讀書饑涎」。於是，很直接率性地向青木說：「內藤先生是否有意刊布此項《遺書》呢？」緊接著又說：「若一時不刊布，他能許我借觀此書的〈目錄〉嗎！」胡適所說，多少顯示了其「學術敏感度」，不過，他真正感興趣的並不是〈目錄〉，而是整部「遺書」。最後還不忘向青木說：「他若能把他所得的《遺書》刊布出來，豈非支那學上一大快事！」、「請先生替我問一問內藤先生好嗎？」<sup>22</sup>

李慈銘(1830-1895)《越縵堂讀書記》中，曾有〈章氏遺書〉與〈實齋雜著〉兩條札記。札記中李氏雖極力譏諷章氏，但最終也希望「借得全稿後，並取已刻者為之編次刊削，成一鉅集，鳩同志刻之<sup>23</sup>」。蕭穆(1835-1904)《國粹學報》發表的〈記章氏遺書〉一文也曾說：「章氏遺書」各種舊鈔本一直在學者間流

<sup>21</sup> 1920年11月11日胡適致青木信說：「把中國的長處越發發達，短的地方把西洋文藝的優點拿來，漸漸冀補，可以做一大大新的真文藝」，參耿雲志(編)，〈關於胡適與青木正兒的往來書信〉，《胡適研究叢刊(第一輯)》，頁307；1920年12月25日青木函胡適信說：「我要把支那文學和日本固有文學作我的文學上『個性』，把『觀察』和『方法』自從西洋文藝裡借來，建設我自己的藝術。未知這個理想我做到得不不做到？」參耿雲志(編)，〈關於胡適與青木正兒的往來書信〉，《胡適研究叢刊(第一輯)》，頁314；而關於青木與胡適彼此投契之脈絡，參桑兵，《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》(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1)，頁91-93；徐雁平，〈近代中日學術交流考論——以胡適與青木正兒為中心〉，《漢學研究》，20：2(台北，2002.12)，81-107。

<sup>22</sup> 1920年12月14日胡適致青木信，參耿雲志(編)，〈關於胡適與青木正兒的往來書信〉，《胡適研究叢刊(第一輯)》，頁311。

<sup>23</sup> 參李慈銘，《越縵堂讀書記》(上海：上海書店出版社，2000)，頁1047-1048。

傳，視為珍寶<sup>24</sup>。所以錢穆(1895-1990)在《近三百年學術史》第九章〈章學誠〉中所說的：「時文網尚密，故書未刊布(後《國粹學報》始為排印)，經生竊其說治經……<sup>25</sup>」。可以知道，「章氏遺書」在近代中國學術史的「流傳閱讀史」上，呈現地正是一幅奇異的景象，書雖長久未得以刊刻出版，但在學人網絡中卻不斷地靠傳鈔保持流通。而內藤所藏的「章氏遺書」，亦透過中國學術人脈之助。

當然，胡適很希望內藤能大方的刊布或借他抄錄，若依青木與其通信的內容來看，這種渴望似乎頗為迫切。在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十四日與青木通信後，十二月二十一日青木回函說：「學堂考試……沒有寸暇……等到俗事都完……且慢慢的談罷<sup>26</sup>」。後在十二月二十五日，青木來函說，正式去拜訪了，不過因為內藤外出，沒有辦成。又輾轉經過多次拜訪，青木才正式見到內藤。一直到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七日青木函說：「胡適之先生：我想〈章氏遺書目錄〉你已經收到了<sup>27</sup>」。胡適最終得到了〈目錄〉及部分篇章，並非整份《遺書》。然而，這個結果早在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信中，青木就多有暗示，曾告訴胡適：刊布「遺書」並不可行，因為「日本漢學界」還「很低級」(青木語)，《文史通義》一書讀者絕少，更不說刊布「遺書」了<sup>28</sup>。雖然如此，他還是很

<sup>24</sup> 參蕭穆，〈記章氏遺書〉，《國粹學報》，70(上海，1910.8)，頁4-6。

<sup>25</sup> 錢穆，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》(台北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1980)，頁392。

<sup>26</sup> 1920年12月21日青木致胡適信，參耿雲志(編)，〈關於胡適與青木正兒的往來書信〉，《胡適研究叢刊(第一輯)》，頁312。

<sup>27</sup> 1921年1月27日青木致胡適信，參耿雲志(編)，〈關於胡適與青木正兒的往來書信〉，《胡適研究叢刊(第一輯)》，頁316。

<sup>28</sup> 1920年12月25日青木致胡適信，參耿雲志(編)，〈關於胡適與青木正兒的往來書信〉，《胡適研究叢刊(第一輯)》，頁313。由於青木推崇胡適以西方觀念，重新建設自己的傳統，某種程度上，他們兩人分別被中、日兩方學界視為「新進學者」。當時雖然青木以京都大學學生身份，與同儕發起《支那學》，獲得師生支持。但青木支持「文學革命」的傾向，老師輩的狩野與內藤，多有微詞；就算在同儕中(小島祐馬、本田成之、神田喜一郎等)，其推崇胡適的行為，在《支那學》創辦初期，也獨樹一幟。此可參《支那學》創辦初期第一卷、第二卷的撰文情況，青木對於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支持，幾乎孤軍奮戰，他不但撰文介紹胡適主張，也翻譯吳虞的論著，希望日本也發起一場轟轟烈烈的思想革命。桑兵曾對「《支那學》雜誌」與「京都學派」的細部差異，作過分析，他認為青木等青年人興辦的《支那學》雜誌，與京都學派代表學者內藤湖南與狩野直喜等人，理念並不相合，對其支持新文化運動之行徑，內藤更有批評之意。參桑兵，《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》，頁92。



樂意幫胡適一問。

## 2. 浙江圖書館排印「章氏遺書」

雖然內藤藏本一事，一直沒有結果，但胡適收尋的細胞早已被激發出來。胡適在還沒正式收到青木寄來的目錄之前，不斷地委託人在國內訪查。在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四日給青木的信中，曾告知其新收穫：查得浙江圖書館藏有鈔本「章氏遺書」一部<sup>29</sup>。胡適本來託人前去訪鈔，不過，卻意外地帶回已排印出版的「章氏遺書」一部，共十二冊，三十四卷。胡適極為興奮，大膽地假設為「中國最完全的《章氏遺書》」，但閱讀後發現此書「校對不精，錯誤甚多」，他在寫給青木的信中仍不忘提及地說：假如內藤沒有此書，我可以寄贈一部給他，希望他能用此本，校對他的鈔本，然後把結果發表出來，給我們共同使用<sup>30</sup>。顯示他內心還是對內藤藏的鈔本耿耿於懷。

胡適與內藤並不熟識，而青木雖是京都大學的學生，但從與胡適信函中觀察，他與內藤的關係似乎仍有些距離，畢竟是老師輩的，青木若不是受胡適請託，也不會冒昧登門拜訪<sup>31</sup>。胡適主動寄贈圖書事，再一次地突顯了他迫切「饑涎」內藤藏本。然而，對於胡適三番兩次的積極主動，內藤方面究竟是如何看待的呢？在一九二二年胡適《章實齋先生年譜》出版後，就很禮貌地寄贈內藤指正，內藤如何回應？很值得觀察。一九二五年，內藤針對胡適《章實齋先生年譜》撰寫了回應書評，發表在《支那學》二卷九期。文中特別強調胡適是一位「新進學者」，也對青木牽線、代鈔〈目錄〉及部分篇章等事，印象深刻，並由衷地感謝胡適慷慨相贈浙江圖書館排印「章氏遺書」並修訂他的錯誤；不

<sup>29</sup> 1921年1月24日胡適致青木信，參耿雲志(編)，〈關於胡適與青木正兒的往來書信〉，《胡適研究叢刊(第一輯)》，頁315-316。另關於胡適〈自序〉上的「次序失真」：胡適並不是收到青木寄來的內藤藏本〈目錄〉後才得到浙江圖書館排印本，事實是，他在獲得浙江圖書館排印本後，才收到青木寄的目錄。

<sup>30</sup> 1921年1月24日胡適致青木信，參耿雲志(編)，〈關於胡適與青木正兒的往來書信〉，《胡適研究叢刊(第一輯)》，頁316。

<sup>31</sup> 1920年12月25日青木致胡適信，曾表明拜訪內藤未果一事。參耿雲志(編)，〈關於胡適與青木正兒的往來書信〉，《胡適研究叢刊(第一輯)》，頁313。

過，卻對胡適對浙江圖書館「章氏遺書」的版本論斷，十分不滿<sup>32</sup>。內藤認為：胡適所用的浙江圖書館排印本，比其所藏稿本十八冊，價值「大差矣」。理由是：他所藏的「遺書」〈目錄〉係章先生晚年遺留，其草稿的整理乃依賴章氏門人蕭山王宗炎(1755-1826)的編定。此本在已刻的《文史通義》各篇下方，分別有注標明。而浙江刊本卻根本未有，可知「大差矣<sup>33</sup>」。然而，依照青木所鈔回給胡適的〈目錄〉來看，內藤所藏比浙江圖書館本還有十五篇文章的差異<sup>34</sup>。

對內藤而言，他關注並非浙江圖書館排印本，而是中國其他藏本的狀況。他曾透過青木轉告胡適，可以前往調查沈曾植、沈曾桐家藏本的線索。不過內藤之所以會透露此事，乃是希望胡適得到自己藏本的〈目錄〉後，也能幫他調查沈氏家藏本的狀況<sup>35</sup>。內藤對於「借鈔全書」或「刊行全書」，則十分保留，一直不願鬆口。畢竟：一、辛苦得到的罕見珍本，何以如此容易借出；二、他與胡適並不認識，更不用說是一面之緣了。然而，以內藤的「學術交遊網」來看，他早在一九〇二年就與沈曾植(1850-1922)等一批中國學人認識，並且多次論學<sup>36</sup>。不過，當時沈氏家藏本早已經提供給劉承幹的嘉業堂，作為籌組刊刻「章氏遺書」的底本<sup>37</sup>。後來，可能是其他事務或研究繁忙的關係，胡適一直沒有得到沈氏家藏本的下落。據《日記》的記載，從內藤轉告訊息後，胡適一直到一九二一年八月十一日，過了近六個多月，才在商務印書館編輯孫毓修

<sup>32</sup> 內藤湖南，〈胡適之の新著章實齋年譜を讀む〉，《支那學》，2：9(京都，1925.5)，頁2。

<sup>33</sup> 內藤湖南，〈胡適之の新著章實齋年譜を讀む〉，頁2。

<sup>34</sup> 十五篇如下：「卷一，〈禮教〉、卷四，〈所見〉、卷七，〈與孫淵如觀察論學十規〉、卷十三，〈讀道古堂文集〉、卷十八，〈陳伯恩別傳〉、〈書李孝婦事〉、〈書李節婦事〉、卷二十，〈高太宜人傳〉、〈童孺人家傳〉、〈章氏二小女傳〉、〈李繫目小傳〉、〈田孺人行實〉、〈從嫂荀孺人行實〉、卷二十一，〈四書釋理序〉、卷二十九，〈又與正甫論文〉」。原載1921年2月3日胡適致青木信，參耿雲志(編)，〈關於胡適與青木正兒的往來書信〉，《胡適研究叢刊(第一輯)》，頁317-318。

<sup>35</sup> 1921年1月27日青木致胡適信，參耿雲志(編)，〈關於胡適與青木正兒的往來書信〉，《胡適研究叢刊(第一輯)》，頁316。

<sup>36</sup> 《內藤湖南全集》，中收有沈子培(曾植)信函兩封，〈年譜〉中也有1902年與沈曾植交往之紀錄。參內藤乾吉、神田喜一郎(編)，〈著作目錄〉，《內藤湖南全集》，第1卷(東京：筑摩書房，1976)，頁750。

<sup>37</sup> 劉承幹，〈《章氏遺書》序〉，《章學誠遺書》(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85，景印嘉業堂刊本)，頁2；史城，〈《章學誠遺書》序〉，《章學誠遺書》，頁9。

(1871-1923)處，得知劉承幹籌刻「章氏遺書」，恍然大悟，他在《日記》中記下：「見孫星如(毓修)。……孫君現主管《四部叢刊》事……他說劉翰怡君現方刻一部《章實齋全書》，此大可喜<sup>38</sup>」。

### 3. 劉承幹籌刻「章氏遺書」

從對內藤藏本的「饑涎」，到對浙江圖書館本的「論斷」，胡適對於「章氏遺書」的「版本認定」，經歷了兩次轉折，但他希望在本國境內達成一件「別人未曾做過的事」的計畫卻從未停息。同時他也在進行著《紅樓夢》與《水滸傳》研究。據《日記》記載，恍然大悟前，胡適撰寫年譜的動力，因為內藤拒借亦不刊布，而他尋書無新發現的關係，有一段時間暫時停滯了<sup>39</sup>。但在得知內藤所說的沈氏家藏本下落後，又再次熱情了起來，積極地想要與參與籌刻計畫的學人交換訊息。在一九二一年八月十一日，胡適在商務印書館與孫毓修談及劉承幹籌刻「章氏遺書」後，隔日八月十二日的《日記》，便記有閱讀相關整理籌刻「章氏遺書」的學人著述事，側面地顯示了胡適對他們的關注<sup>40</sup>。然而，劉承幹的籌刻計畫，早已經在進行，若沒有適當的訊息價值能夠互惠交換，胡適也不便冒然提出失禮要求。一九二一年九月二日，他又再次與孫毓修談及此事，事情終於出現了轉機。孫毓修告訴他，劉承幹的籌刻計畫中也有撰寫《章實齋年譜》事，已請孫德謙負責。胡適聽後眼睛一亮，連忙告訴孫毓修，自己也正在撰寫一部《章實齋年譜》，還未成書，假如孫德謙想參考，我可以寄一部稿子給他，不過希望能借閱籌刻中的全書〈目錄〉，如果他們願意，連自己手上的內藤藏本〈目錄〉也可以借給他們參考<sup>41</sup>。胡適主動將自己未完的《年

<sup>38</sup> 胡適(著)，曹伯言(整理)，《胡適日記全編》，第3冊，頁426-427。

<sup>39</sup> 從1921年6月16日-8月10日間，近兩二月，胡適日記中不再出現關於閱讀、撰述章學誠的相關記錄，與之前相較明顯停滯。而在8月11日後，章學誠相關事，又密集出現，一直到10月27日，全書完成。

<sup>40</sup> 「讀孫德謙(字益菴，元和人)的《諸子通考》……但此書究竟可算是近年一部有見地的書，……見解遠勝於張爾田的《史微》」。參胡適(著)，曹伯言(整理)，《胡適日記全編》，第3冊，頁428-430。

<sup>41</sup> 胡適(著)，曹伯言(整理)，《胡適日記全編》，第3冊，頁457。

譜》之作與內藤〈目錄〉，作為互惠的籌碼，只希望能借觀全書〈目錄〉，但是似乎沒有馬上得到善意的回應<sup>42</sup>。一九二一年九月十三日，胡適雖然沒有得到劉刻本〈目錄〉，但他還是決定允許孫毓修將自己未完的《章實齋先生年譜》稿寄給孫德謙參考。不過同時，他也決定即刻將停滯已久的《章實齋先生年譜》請到桌案上，用盡可能的速度完成，他不想自己的努力跟已經在稿中表述的「用意與方法」白費，雖然無法盡善盡美，但最終「至少可以補內藤的缺陷<sup>43</sup>」。在連番碰釘子失望下，他又回到最初「訂補」內藤的心境。從九月十三日起到十月二十七日，他密集地補完了全稿，約四萬五千字。在十一月五日委託商務館經理李宣龔(1875-1953)帶往南方付印(上海商務印書館)<sup>44</sup>。而後來，孫德謙所撰《實齋年譜》，始終沒有完成。劉承幹刻本正式出版後，孫德謙曾在寫給李詳(1859-1931)(當時李氏也參與嘉業堂篆刻「章氏遺書」計畫)的信中，透露了一些情況，他說：「實齋《遺書》，刻成伊邇。《年譜》則尚未脫稿。不但事冗，外間作此者，已有兩種，故心志稍懈耳<sup>45</sup>」。

從以上撰寫過程發生三次轉折，可以確知胡適是將自己擺置於一場「新事業」的追求上；如何做一件「別人未曾做過的事」，主導了他在撰述、研究中

<sup>42</sup> 1922年1月21日，〈胡序〉說：「章實齋的著作，現在雖然漸漸出來了，但散失的還不少。我最抱歉的是，沒有見著〈庚辛之間亡友傳〉，《年譜》付印後，我纔知道劉翰怡先生有此書，劉先生現在刻的《章氏遺書》此書列入第十九卷，刻成後定可使我們添許多作傳的材料。劉先生藏的《章氏遺書》中還有《永清縣志》二十五篇、《和州志》(不全)三卷，我都沒見過。」又在《日記》1921年11月5日條下有：「《實齋年譜》即由拔可明天帶回南去付印」。參胡適(著)，曹伯言(整理)，《胡適日記全編》，第3冊，頁510。故筆者推論在1921年11月5日前，胡適並未見過劉承幹的〈目錄〉；又劉氏刻本出版後，胡氏在1923年7月11日，為了感謝劉氏贈送整部「劉刻」《章氏遺書》曾去函，從函文內容，直接證明，胡適一直到「劉本」出版後，才正式看到〈目錄〉。參梁穎(整理)，〈梁啓超、胡適致劉承幹手札〉，《歷史文獻》，第四輯(上海：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，2001)，頁76-77。

<sup>43</sup> 胡適(著)，曹伯言(整理)，《胡適日記全編》，第3冊，頁468。

<sup>44</sup> 胡適(著)，曹伯言(整理)，《胡適日記全編》，第3冊，頁510。

<sup>45</sup> 信中所言「兩種」，乃指內藤與胡適的兩種《年譜》，函中有「實齋《遺書》，刻成伊邇」之語，所以繫年大約是在1922年秋天劉刻《章氏遺書》出版後。參李審言，〈李審言交遊書札選存〉，《學士》，第一期(廣州：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，1996)，頁44；另錢仲聯(編)的《廣清碑傳集》中，收有王蘧常撰〈清故貞士元和孫隘堪行狀〉，亦記載《章實齋年譜》未成。參王蘧常，〈清故貞士元和孫隘堪行狀〉，《廣清碑傳集》(蘇州：蘇州大學出版社，1999)，頁1314。

的「行動」。在「『遺書』版本」上，同時面對著內藤藏本(日本)、浙江圖書館本到嘉業堂本的學術競爭。最終，決定趕快完成《年譜》，付印出版，果然搶到了「國內第一」。但對胡適來說，《章實齋先生年譜》的「大膽論斷、積極行動」的態度，也在他心中產生了一些揮之不去的心理陰影。因為《年譜》出版雖然搶先了，不過內容卻仍錯誤百出，不夠完美。畢竟，一部完美的《年譜》，首要條件乃是得收集夠份量的譜主遺文。胡適知道如果無法在「版本」上取得「制空權」，是無法讓海內外學人心服口服的。但樂觀如他，一九二二年二月二十六日的《日記》中，還是為自己的「貢獻」提出了一個心理平衡的解釋：

此書還是我的一種玩意兒，但這也可見對於一個人作詳細研究的不容易。我費了半年的閑空功夫，方才真正了解一個章學誠。作史學真不容易！若我對於人人都要用這樣一番功夫。我的《哲學史》真是沒有付印的日子了！我現在只希望開山闢地、大刀闊斧的砍去，讓後來的能者來做細緻的功夫。但用大刀闊斧的人也需要有拿得起繡花針的本領。我這本《年譜》雖是一時高興之作，他卻給了我一點拿繡花針的訓練。<sup>46</sup>

### 三、從「胡譜到姚譜」的版本脈絡與訂補狀況

從「胡譜」撰成正式出版後，在檯面上，胡適終生再也沒有對章學誠的生平和學術有所論述。而到了一九三一年，另一部更完整的「訂補本」出版了。毫無疑問，一九二二年的「初撰本」與一九三一年的「訂補本」，是二份各有不同身世的版本。有鑑於此，要瞭解其中個別脈絡，首先必須從校勘入手，也就是吳天任所說的：通過校勘，瞭解哪些是原來的，哪些是增訂的<sup>47</sup>。然而，研究條件與研究意圖的限制，使得吳天任並沒有進一步深入胡姚兩人背後的

<sup>46</sup> 胡適(著)，曹伯言(整理)，《胡適日記全編》，第3冊，頁565。

<sup>47</sup> 吳天任，〈胡著姚訂章實齋年譜商榷〉，《章實齋的史學》，頁250。

「後史」發展<sup>48</sup>。不過他利用「胡譜(初撰本)」、「合譜(訂補本)」和「姚譜(姚自撰本)」三種版本的比對，已經取得很大的貢獻<sup>49</sup>。透過校勘來瞭解更多細節，本是一種「知人論世」的研究傳統；豈知，校勘之難亦是由此而起。雖然書的封面上「訂補者」直署為姚名達，但根據內容，絕非所有原書以外的增訂，都全屬於姚名達的責任範圍。哪麼，究竟誰是誰呢？遂成爲一個本文也無法全然解決的困難問題。不過，藉由校勘，得以發現在各種不同的文獻與研究中，已解決、未解決的問題。在這個基礎上，校勘的功夫仍是瞭解各種書籍背後人的身影的最好方法之一。此段將以版本校勘的主題作爲研究基礎，透過仔細考察各種版本的發展與差異，陳述其中脈絡，呈現「從胡譜到姚譜」，版本與訂補發展的圖像。

### 1. 版本流傳脈絡

從「胡譜到姚譜」的版本發展，涵蓋了四個《章實齋先生年譜》的脈絡。依其時間序列分別是：(一)內藤湖南，〈章實齋先生年譜〉，《支那學》，1：3-1：4(京都，1920.11-1920.12)，頁 14-24；頁 44-52；(二)胡適，《章實齋先生年譜》，(上海：商務印書館，1922)；(三)姚名達，〈會稽章實齋先生年譜〉，《國學月報》，2：4(北京，1927.4)，頁 185-211；(四)胡適著，姚名達訂補，《章實齋先生年譜(訂補本)》(上海：商務印書館，1931)。據此，可以分別簡稱爲：「內藤譜」、「胡譜」、「姚譜」、「訂補譜」。而這四個不同的《章實齋先生年譜》又有其各自的出版脈絡。

「內藤譜」在一九二〇年正式出版後，內藤又在一九二八年，匯集一九二〇年以來在《支那學》的文章，刊爲《研幾小錄》一書，不過這次的收入已經與一九二〇年的版本身份不同，因爲內藤根據胡適對他的訂補與新出資料，重新修訂了此文<sup>50</sup>。而後一九七六年，《內藤湖南全集》編輯出版(一九六九年陸續

<sup>48</sup> 這裡指的「後史」，就是引含在書中，從「胡譜」撰述到「訂補譜」發展的人書歷程史。

<sup>49</sup> 所謂「胡譜」、「姚譜」、「合譜」，乃吳氏自己校勘的簡稱。參吳天任，〈胡著姚訂章實齋年譜商榷〉，《章實齋的史學》，頁 250。

<sup>50</sup> 內藤湖南，〈章學誠先生年譜〉，《研幾小錄》(東京：宏文堂書房，1928)，頁 113-136。

整理出版，至一九七六年出齊），此文乃據《研幾小錄》本被收入<sup>51</sup>。至於「胡譜」，一推出就極為暢銷，隔年一九二三年十月就重印再版，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再重印，短短三年內一共印了三次。銷售的狀況好，也引起了許多人的關注，如：一九二二年五月，方年二十一歲的南京東南大學學生張其昀(1901-1985)，便在胡適引起的風潮下，寫了一篇〈劉知幾與章學誠之史學〉，在東南大學跨科系出版的《學衡》雜誌和東南大學史地學會出版的《史地學報》刊載，是現代出版的學術刊物中，最早引用「胡譜」的論文<sup>52</sup>；北大畢業後，回到東北任職的金毓黻(1887-1962)，在《靜晤室日記》一九二二年二月三十一日也有：「購《章實齋年譜》一冊，胡適之先生所著也<sup>53</sup>」的紀實。從時間與所處地域，可以知曉「胡譜」傳播速度相當快。姚名達自己也是在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九日到四月二十三日間，讀完「胡譜」後，才「恍惚地」想去研究章學誠<sup>54</sup>。除了上述的這些例子外，也有許多因不滿意而產生的各種：改作、另作、評議的情況出現<sup>55</sup>。至於「姚譜」，在一九二七年於《國學月報》出版後，就一直沒有重排修訂或重新出版，可能由於姚氏英年早逝，其著作未能得到後世應有的重視；僅在一九七五年時，由香港存粹學社編輯「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參考資料(第六輯)」的《章實齋先生年譜彙編》時，將舊有《國學月報》版影印附入<sup>56</sup>。相

<sup>51</sup> 參內藤湖南，《內藤湖南全集》，第七卷，頁 67-79。

<sup>52</sup> 此文〈劉知幾與章學誠之史學〉原載於：《學衡》，1：5(1922.5)，頁 1-53；後又經轉載，編入作者所就讀的東南大學歷史系·史地學會：《史地學報》，1：3(1922.5)，頁 133-151；1：4(1922.8)，頁 105-132。中連載，在《史地學報》中，著者改名為〈讀史通與文史通義、校讎通義〉，編入〈書籍評論〉欄目中。文中有引用「胡譜」的註解，當是現代出版的學術刊物中最早引用胡譜的論文。

<sup>53</sup> 金毓黻，《靜晤室日記》，第一冊(瀋陽：遼瀋書社，1993)，頁 568。

<sup>54</sup> 姚名達，〈姚序〉，《章實齋先生年譜(訂補本)》，頁 1。

<sup>55</sup> 「改作」：趙譽船(編)，《章實齋先生年譜》(未知：民國間石印本)。趙譽船在全書末尾處說：「這是依據胡適年譜改編的，除去胡氏議論之語，凡是先生的著作，有可考的，此譜全為收入」。參趙譽船(編)，《章實齋先生年譜》，頁 11-12；「另作」：范耕研，《章實齋先生年譜》(台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99)。范氏此書於 1927 年寫成，經年未刊，後人於 1992 年由大陸取稿回台出版，參董金裕，〈董序〉，《章實齋先生年譜》，頁 9-18；「評議」：內藤湖南，〈胡適之の新著章實齋年譜を讀む〉，《支那學》，2：9(京都，1925.5)，頁 1-16；一士，〈胡著章實齋年譜贅辭〉，《國聞週報》，6：37(天津，1929.9.22)，頁 1-2。

<sup>56</sup> 存粹學社(編)，《章實齋先生年譜彙編》(香港：崇文書店，1975)。

較於以上這些版本的流傳狀況，「訂補譜」可以說是流傳最廣的版本了。從一九三一年問世以來，一直到二〇〇四年，不斷地再版重印，究竟印過幾次？簡直難以統計，其中單單商務印書館本身，就因叢書重複的收入，難以估計，如「國學小叢書」、「萬有文庫」、「中國史學叢書」、到後來台灣商務的「人人文庫」、「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」都有收入，且再版。更不用說其他的出版社了，如台灣的文星雜誌社出版的「文星叢刊」、遠流出版社的「胡適作品集」；大陸的北京大學出版社的「胡適文集」、安徽教育出版社的「胡適全集」……等等。他們所收的都是「訂補譜」。而後來甚至出現有單署為「胡適撰」，刪除「姚名達訂補」的情形<sup>57</sup>，可知在後世流行傳播的加持下，人們印象中的「訂補譜」漸漸地與胡適直接劃上等號。

## 2. 事文差異

吳天任曾說過：與「訂補譜」較之「胡譜」錯漏更多。然而在流行傳播上，影響力最大的是「訂補本」，這是無可置喙的。但是究竟兩個版本有什麼具體的差異呢？而所關注的，不應只強調於撰述內容引述考證的正誤，還要注意在時間先後的不同版本與不同研究解釋中的問題交織。因為對於二個不同身份的版本來說，都是「後史」發展中至關重要的線索。以下將利用吳天任已經探討的「差異」（並檢討吳氏的錯誤），輔以吳氏未能閱讀的「內藤譜」，來具體呈現四種版本所交織的「事文差異」，以及背後可能存在的互動交流網絡。

根據吳天任對「訂補譜」的商榷文字，他認為「訂補譜」的問題，可以分為三項來討論：（一）事文的漏誤；（二）稱謂的凌亂；（三）批評的不當。所謂「事文的漏誤」指的是內容引述文獻或考證史事的失誤；「稱謂的凌亂」是稱謂的不統一；「批評的不當」則是針對原本「胡譜」收入各種對於譜主思想、學術、生平，各種正面的、反面的批評而發的。對於以上三項，第一項「事文的漏誤」共有二十一條，內容具體，份量最多；第二項「稱謂的凌亂」僅有一條，無關

<sup>57</sup> 安徽教育出版社於1999年出版「胡適著譯精品」系列書，其中所收「訂補譜」，就僅單屬胡適著。



宏旨；第三項「批評的不當」則有八條，討論雖多，但主要是針對胡適個人引進新的批評體例。根據吳氏的看法，「批評的不當」幾乎都是從「胡譜」保留下來的。而關於「胡譜」、「姚譜」與「訂補譜」的差異，則多體現於「事文的漏誤」<sup>58</sup>。基本上，吳天任雖然使用了「胡譜」、「姚譜」與「訂補譜」來校勘，強調區分的必要；也知道「訂補譜」，並非一人而成，但卻對於「訂補譜」中再次胡姚身份錯亂的情形，不甚注意。由於商榷文是針對「訂補譜」而撰，吳氏在「事文的漏誤」中，也卻多次將「胡譜」的錯誤，移植成「訂補譜」，反而使得他欲理解的事實，產生誤差。可供比較具體的「事文差異」例子列表如下：

繫年	吳氏校勘商榷	筆者重校	訂補區分
乾隆二十九年 (一七六四)	吳天任認為「訂補譜」將〈與甄秀才論修志書〉列於此，而「姚譜」列於乾隆二十八年，「姚譜」正確，「訂補譜」誤。	在此，吳氏將「胡譜」與「訂補譜」弄混了，所謂的「訂補譜」實為「胡譜」原有。「姚譜」雖列為乾隆二十八年，但他為胡適訂補的方式是：不改正原來的乾隆二十九年，另在乾隆二十八年下注說明。	姚訂補
乾隆三十四年 (一七六九)	吳天任認為「訂補譜」中的「任朝」與另外在乾隆四十年條的「任朝」，都是「侍朝」之誤，因為〈庚辛之間亡友傳〉第一篇就是「侍朝傳」。	吳氏沒有發現雖然乾隆三十四年條的「任朝」是「訂補譜」之誤，但乾隆四十年條的「任朝」卻是「胡譜」原有的，而另在同四十年條下另有「訂補譜」的「乙未丙甲之間，蹙蹙無所就，侍朝為之籌畫甚至」之語，可知訂補者未必不知其誤。另外「姚譜」在乾隆三十四年條也寫「任朝」，故這裡的訂補者到底是胡適，還是姚名達，則無法進一步判定。	無法區分
乾隆三十五年 (一七七〇)	吳天任認為「訂補譜」朱筠贈詩出於「朱笥河詩鈔」有誤，	姚名達自撰《朱筠年譜》稱「詩集」，可知此條「詩鈔」，乃為	胡訂補

<sup>58</sup> 吳天任在「事文的漏誤」雖舉有二十一條，但具體根據校勘比對的討論僅有十七條。

	應為「詩集」。而在「訂補譜」文後加收的〈校補後記〉有胡適校補語數條，已改為「詩集」，但又逕將此詩改列為乾隆四十七年，大誤。	胡適自訂補，而後又在〈校補後記〉中改回「詩集」。從又改列為乾隆四十七年來看，更是姚氏沒有參與此條訂補的證明。	
乾隆三十八年 (一七七三)	關於四庫館開館校書摺子事，「胡譜」列三十六年；「訂補譜」列為三十八年；「姚譜」列為三十七年。吳天任認為「胡譜」根據的是朱筠當年十一月任安徽學政，以為上摺就在此年。而「姚譜」則是因開館摺有先後兩摺，以第一摺為始而訂。至於「訂補譜」列三十八年，係認定正式開始應在第二摺，都有其合理的由原。	「胡譜」所據朱筠任安徽學政，乃從「內藤譜」，不過內藤沒有談及四庫館事，可作為「胡譜」撰述底本採自「內藤譜」的補證。另「姚譜」與「訂補譜」的不同，乃是「訂補譜」胡姚或其他人共同參與討論的線索。	胡、姚
乾隆三十七年 (一七七四)	此條大改動，吳天任沒有討論。	「胡譜」原將譜主上書錢大昕的〈上辛楣宮詹書〉列於嘉慶三年(一七九八)，而「訂補譜」改列於此乾隆三十七年，另「姚譜」亦訂於乾隆三十七年。大致可知，這是姚名達考證改動的。	姚訂補
乾隆四十三年 (一七七八)	關於考上進士的記述，「胡譜」寫的是：「先生成進士」；「姚譜」是：「應禮部會試，賜戴衢亨榜進士出身」；「訂補譜」是：「先生旋成進士，歸部待詮」。吳天任認為考上進士是譜主一生大事，應敘述詳細才合知人論世之旨。他參考許多資料補充，也引用房兆楹、杜聯喆夫婦增編的《清朝進士題名碑錄》，說明章學誠是二甲進士列名五十一名。	參「內藤譜」，已明錄此事：「二甲第五十一名」。	
乾隆四十六年 (一七八一)	吳天任認為「姚譜」有「長子貽選，從學邵晉涵於北京」事，甚為重要，但「胡譜」與「訂補譜」均缺。	此可知，「訂補譜」增訂的，未必均屬姚名達的責任範圍；而「姚譜」有的，不一定會增訂入「訂補譜」。	姚沒能訂補

<p>乾隆五十五年 (一七九〇)</p>	<p>「訂補譜」有「刪訂永清全志為新志二十六篇」。吳天任認為此大誤，而「姚譜」乾隆五十四年的「永清全志刪訂二十六篇為永清新志十篇」才是正確的。</p>	<p>「姚譜」應為乾隆五十五年，吳氏誤。另外吳天任發現「訂補譜」在乾隆五十五年與五十七年，有重複引用〈方志立三書議〉的「凡欲經紀一方之文獻，必立三家之學，……闕一不可」之迹，應刪去五十七年的部分。又，吳氏將「胡譜」的問題，誤植為「訂補譜」，只能說「訂補譜」沒有改正。</p>	<p>姚沒能訂補</p>
<p>乾隆五十八年 (一七九三)</p>	<p>吳天任認為「訂補譜」所寫：「按先生代畢沅作〈《通志》序〉……當成於癸丑甲寅之間」，與原序文相差太遠；而另「訂補譜」的「先生在這幾年之中，除主修《通志》外；尚修有湖北的幾種府縣志……」，所寫不佳。而「姚譜」乾隆五十九年的「編《通志》時，又撰《常德府志》，又撰《荊州府志》，《麻城縣志》」，沒有提及湖北，比較簡淨。</p>	<p>吳氏的「訂補譜」應為「胡譜」之誤植。只能說「訂補譜」沒有訂正</p>	<p>姚沒能訂補</p>
<p>嘉慶二年 (一七九七)</p>	<p>吳天任認為「訂補譜」的曾燠〈贈實齋齊國博〉詩，應比照「姚譜」，接於譜主〈丁巳歲暮投贈賓谷轉進〉詩後，「畢沅卒於辰州軍中」前，較符合實況。</p>	<p>吳氏將「胡譜」誤植為「訂補譜」。只能說「訂補譜」沒有訂正。</p>	<p>姚沒能訂補</p>
<p>嘉慶三年 (一七九八)</p>	<p>吳天任認為「訂補譜」：「借謝啓崑之力，補修《史籍考》」。中的「崑」應為「昆」。</p>	<p>吳氏沒注意「姚譜」也作「崑」，可知此條為姚名達訂補。</p>	<p>姚訂補</p>

以上可知，關於「事文差異」的問題，呈現的並非只有究竟誰對誰錯的問題，還有在先後出版脈絡中，互相交流、改動、交鋒的現象。姚名達雖然是訂補的署名人，但為「胡譜」這樣一本有特殊形成歷程(前史)的書來訂補，身處

於所謂現代章學誠研究，以「內藤譜」、「胡譜」為中心逐漸形成的網絡中，他的訂補行動的責任歸屬則難定，往往含有各種問題先後交織。故，先後訂補行動中「事文差異」的問題，有意識的、無意識的、文缺的、改立的……種種，都是交互網絡中的重要現象。「胡譜」原先撰述的主旨之一是訂補「內藤譜」，故在「胡譜」各繫年條下，也有訂正「內藤譜」的文字，而這些訂正文字在後來的「訂補譜」中獲得完整保留。

「胡譜」於一九二二年二月正式出版後，胡適親自寄贈內藤評閱。內藤在一九二五年五月在京都大學《支那學》上發表了一篇〈胡適之新著《章實齋年譜》讀後〉的回應文字。一九二二年的「胡譜」中，胡適曾在不同的繫年條下訂補內藤，共有：譜前、乾隆四十一年、乾隆五十一年、嘉慶元年、嘉慶三年、嘉慶四年，共六條。內藤在回應中，只承認了四條，主要都是文字更正或干支錯誤。而有兩條並未得內藤承認，一條是：乾隆五十一年胡適訂〈月夜遊蓮池記〉為十二月十日，而「『內藤譜』作二十日」。由於內藤沒有任何說明與重新修訂，代表了未能接受<sup>59</sup>；另一條是：嘉慶三年下的「內藤譜誤脫一年」。根據內藤的回應是：這條不是誤脫，而是根本沒有記述。除此之外，內藤更根據「胡譜」的內容，舉出另外可補的八條，其中有三條是由於未能讀到汪輝祖《病榻夢痕錄》。這是胡適受他所著年譜影響後，又反受其影響的訂補效應。不過，內藤馬上又從回應者的身份，扮演起「再訂補」的角色，對「胡譜」提出了五條訂補：

- (1) 朱筠弟子李威〈從遊記〉，「胡譜」置於乾隆三十二年是否得當？「內藤譜」自己則是據朱筠於乾隆三十七年任安徽學政，而訂年。
- (2) 「內藤譜」在乾隆三十九年據〈金地山印譜序〉訂此年譜主參加「浙江鄉試」，而「胡譜」則缺此事，是否應補？
- (3) 「內藤譜」認為譜主於乾隆四十七年主講永平敬勝書院，而「胡譜」

<sup>59</sup> 關於〈月夜遊蓮池記〉，「姚譜」則訂為「十二月」，可知姚名達亦沒有把握確定詳細日期。參姚名達，〈會稽章實齋先生年譜〉，頁 203。

訂為四十八年「病癒後，回永平主講敬勝書院」，適當否？

(4)在「胡譜」乾隆五十二年條下，「長孫女及第三子殤於保定」，又載「僑寓保定，寄居旅店，第五子殤」，實無後事，而前事誤「第五子」為「第三子」。

(5)嘉慶三年，譜主〈八座雲說〉內容記載的事應補入，而此事「內藤譜」與「胡譜」均沒有記載。

這五條內藤的「再訂補」，胡適如何回應呢？可以在一九三一年的「訂補譜」上追蹤。第一條：「訂補譜」將李威〈從遊記〉訂為乾隆四十年；第二條：「訂補譜」從內藤訂補增補此事於乾隆三十九年；第三條：「訂補譜」從內藤訂補，於乾隆四十七年補「先生旋講永平敬勝書院」，但仍保留「胡譜」在乾隆四十八年的「病癒後，回永平主講敬勝書院」；第四條：從內藤訂補，改「第三子」為「第五子」；第五條：從內藤建議，增嘉慶三年〈八雲座說〉事。五條中，除第一條「訂補譜」乃是姚名達對朱筠研究的不同看法，改訂為乾隆四十年外，其餘四條皆從內藤的「再訂補」。可知，「訂補譜」內容中，亦有保留胡適對於內藤的「再訂補」的回應，而非僅有姚名達與胡適的身影。這種種交互的訂補行動，竟也構成了後來「訂補譜」的血肉。

#### 四、從胡譜到姚譜的「後史」

一九三一年「訂補譜」，譜後追記了一條「民國九年(一九二〇)」，簡述了從一九二〇年崛起的「現代章學誠研究史」。其中有一段頗受後人爭議的話：「十一年春，本書初版出版。國人始知章先生<sup>60</sup>」。對吳天任來說，這話未免太「大言不慚了」！因為章學誠生前、死後，雖都不顯於時，但從遺著刊布的情形看，也不至於有這種情形<sup>61</sup>。錢穆在一九一三年時，任教於小學，心中常

<sup>60</sup> 胡適(著)，姚名達(訂補)，《章實齋先生年譜(訂補本)》，頁149。

<sup>61</sup> 道光十二年(1832)《文史通義》、《校讎通義》初次刊行，後則有山陰杜氏及南海伍氏的粵雅堂重刊，咸豐四年(1854)有周爾墉刊本，光緒三年(1877)章季真貴陽刊本；光緒八年(1882)彭祖

有未能讀大學的遺憾，一日見報載北京大學招生廣告，投考者必須先讀章學誠《文史通義》，遂尋書檢讀<sup>62</sup>。這也是在一九二〇年之前的事。

那麼訂補者為何要如此記述呢？對於胡適而言，事情的發展，常常也出乎其預料，無法掌握。不過，逐漸以機構、刊物、出版作為發展的現代學術網絡，內藤與胡適先後出版的年譜，正在發揮著前所未有的影響力<sup>63</sup>。所謂「國人始知」，姚名達這一輩的學子，正是見證人。

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三日，初步閱讀完「胡譜」，姚名達在這股力量的吸引下，「恍惚」地想要研究章學誠。此時的他，也如同胡適，並不知道日後會如何。四月二十九日他在上海，聽了一場由何炳松關於《文史通義》的演講後，開始研讀《文史通義》，這是他和何炳松認識的開始<sup>64</sup>。至於何炳松，他與胡適的交往始於一九一三年的夏季，當時胡適擔任《留美學生季報》的編輯，何氏是撰稿人。一九一五年兩人正式結為好友。回國後在北大共事了一段時間。而在一九二二年「胡譜」出版前，何炳松與胡適碰巧「不約而同，而且不相為謀的」，都在研究章學誠<sup>65</sup>。雖交情匪淺，但兩人見解未必相同<sup>66</sup>。數月後，一九二五年九月姚名達考上了北京清華國學研究院，拜入梁啟超門下研究中國史學史，決定以「章實齋的史學」作為論文題目，並「買了浙本，借了劉本」，投入章學研究<sup>67</sup>。就在這段期間，姚名達泛覽了許多資料，開始發現自己與「胡譜」的解釋不盡相同。在一九二五年十月三十一日，他想起了數月前在上海「得接丰儀」的何炳松，去函求教。他認為「胡譜」中將「凡涉著作之林，皆是史

---

賢刊《湖北通志凡例及辨例》……等等，都是民國以前，清代已刊的事實，而「章氏遺書」則有鈔本流傳。參吳天任，〈胡著姚訂章實齋年譜商榷〉，《章實齋的史學》，頁 293。

<sup>62</sup> 錢穆，《八十憶雙親 師友雜憶》（北京：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，1998），頁 89。

<sup>63</sup> 余英時，〈「通古今之變，成一家之學」——《章學誠的生平與思想》中譯本代序〉，《章學誠的生平與思想》（台北：唐山出版社，2003），頁 V。

<sup>64</sup> 姚名達，〈姚序〉，《章實齋先生年譜（訂補本）》，頁 1。

<sup>65</sup> 何炳松自承研究章學誠大約始於 1919 年與 1920 年。參何炳松，〈何序〉，《章實齋先生年譜（訂補本）》，頁 5。

<sup>66</sup> 〈何序〉中有對「胡譜」不認同的地方提出說法。參何炳松，〈何序〉，《章實齋先生年譜（訂補本）》，頁 22-24。

<sup>67</sup> 姚名達，〈姚序〉，《章實齋先生年譜（訂補本）》，頁 1。

學」的「史學」二字解釋成「史料」，乃是由於胡適對於章學誠的「史」、「史學」、「著作」措辭意義沒有徹底的瞭解，混為一談，錯誤解釋了<sup>68</sup>。對於姚名達來函，何炳松十分高興，多方鼓勵這位有志史學研究的後進；然而，對於姚名達提出的「誤釋」說，他認為胡適無誤。何氏以「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學」的「涉」字作為解釋，認為章氏並沒有把話說死，故所謂「著作」與「史料」間並不是絕對的<sup>69</sup>。雖然如此，亦不能代表胡適與何炳松對章學誠研究的立場一致，而與姚名達有別；反而，何炳松與姚名達兩人，在後續的研究歷程，走上了同一條「學派溯源」的道路。

### 1. 學派溯源

姚名達拜入梁啟超門下，以研究章學誠為志，經數月努力後，在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五日起了一個信念：「研究一個人的學術，必須了解他所以成學的原因」，故決定從前人的影響下手，選擇了影響章學誠最深的人邵念魯，打算替他作一本年譜。一月二十七日動手，二月十一日初步完成(此書後來於一九二八年由商務出版<sup>70</sup>)。此後，姚名達逐漸走上了一條「學派溯源」的研究道路。隔年(一九二七)一月十一日，又思考「師承關係」，打算為章學誠的老師朱筠作一本年譜。二月二十一日動手，三月十六日初步完成(此書後來於一九三三年由商務出版<sup>71</sup>)。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三日，姚名達更打算從邵念魯上溯至其師祖劉宗周，發展成浙東史學的研究<sup>72</sup>，於一九三一年八月十七日完成了《劉宗周年譜》(此書於一九三四年出版)。而這些溯源之作，後來全都被何炳松選入他為商務主編的「中國史學叢書」出版。

至於何炳松，則於一九二二年二月，發表了他從一九一九年以來閱讀章學

<sup>68</sup> 姚名達，〈通訊：論史學·姚名達致何炳松函〉，《民鐸雜誌》，6：5(1925.5)，頁1。

<sup>69</sup> 何炳松，〈通訊：論史學·何炳松致姚名達函〉，《民鐸雜誌》，6：5(1925.5)，頁2。

<sup>70</sup> 姚名達，《邵念魯年譜》(上海：商務印書館，1928)。

<sup>71</sup> 姚名達，《朱筠年譜》(上海：商務印書館，1933)。

<sup>72</sup> 姚名達，〈自序〉，《劉宗周年譜》(上海：商務印書館，1934)，頁8。

誠著作的初步心得：〈讀章學誠《文史通義》札記〉<sup>73</sup>；一九二五年二月發展為〈章學誠史學管窺〉<sup>74</sup>；一九二八年十月，受胡適邀請撰寫〈增補章實齋先生年譜序〉<sup>75</sup>；一九三〇年五月至六月在《東方雜誌》上連載了〈程朱辨異〉<sup>76</sup>，後來商務印書館於一九三二年十二月，將此書更名為《浙東學派溯源》，選入「國學小叢書」出版<sup>77</sup>。何炳松在〈自序〉中明確地說出了他研究章學誠以來，後續發展的總結：「要研究中國史學史必須研究中國學術思想史，要研究中國學術思想史必須研究浙東學術史<sup>78</sup>」。

## 2. 體例的影響

姚名達雖然一開始「恍惚」地受了「胡譜」的影響，想去研究章學誠，後來竟走出了一條與胡適完全不同的研究道路，那他究竟如何看待「胡譜」的貢獻呢？他在「訂補譜」〈序〉上曾說：「適之先生這書有一點是我最佩服的，就是體例的革新<sup>79</sup>」。胡適在一九二〇年見了「內藤譜」，起了想要訂補的動念，逐步地在「內藤譜」的基礎上，寫成了一本全新「胡譜」。這本全新的「胡譜」，雖然在資料上無法佔有制空權，也沒能獲得內藤及學者們的全然心服，但當時胡適之所以會費盡心力火速出版，怕的就是他已經在稿內表述的「用意與方法」全數白費。這所謂「用意與方法」，也是胡適開始決定訂補「內藤譜」時，想都沒想到的成果：結合「西方傳記理論」，改造舊有年譜體而成的「新

<sup>73</sup> 何炳松，〈讀章學誠《文史通義》劄記〉，《史地叢刊》，1：3(1922.2)。此據《何炳松文集》，第2卷(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1997)，頁41-78。

<sup>74</sup> 何炳松，〈章學誠史學管窺〉，《民鐸雜誌》，6：2(1925.2)。此據《何炳松文集》，第2卷，頁107-154。

<sup>75</sup> 何炳松〈增補章實齋年譜序〉原載《民鐸雜誌》，9：5(1928.10)。今據〈何序〉，《章實齋先生年譜(訂補版)》，頁1-26。

<sup>76</sup> 此文在《東方雜誌》1930年5月至6月分四期連載。參《東方雜誌》，27：9(上海，1930.5.10)，頁61-84；27：10(上海，1930.5.25)，頁67-86；27：11(上海，1930.6.10)，頁63-87；27：12(上海，1930.6.25)，頁63-78。

<sup>77</sup> 何炳松，《浙東學派溯源》(上海：商務印書館，1933)。

<sup>78</sup> 何炳松，〈自序〉，《浙東學派溯源》，頁8。

<sup>79</sup> 姚名達，〈姚序〉，《章實齋先生年譜(訂補版)》，頁6。



體例」<sup>80</sup>。從一九二二年「胡譜」版權頁上的英文譯名「Life Events of Chang Shih-Chai(Chronologically Arranged)<sup>81</sup>」上看，「Life Events」就是胡適要改造舊體例的「用意與方法」。一九二五年內藤也曾對於胡適指責其年譜「太簡約」，大聲喊冤，他認為胡適所用的並不是「年譜體」，比較像「學案體」（紀錄言行、交遊、學術、生活）<sup>82</sup>，豈知胡適根本是從西方引進的。如果從這個角度觀察，或許「胡譜」對當時中國學術文化圈的影響，這個「新體例」作用較大<sup>83</sup>。對於姚名達來說，他認為「胡譜」的體例革新是：「打破了前人單記行事的體裁」、「摘錄了譜主最重要的文章」、「譜主與同時人的關係」、「注明白史料的出處」、「有批評」、「有考證」、「譜主著述年月大概都有了」<sup>84</sup>。仰慕之餘，也使得姚名達在《邵念魯年譜》中也試創了新體：「直敘法」、「多製圖表」、「關『譜前』『譜後』」<sup>85</sup>。但是他在撰寫「姚譜」時，還是選擇與內藤較為相近的簡略體例。究竟是為什麼呢？他曾在「姚譜」〈引言〉上明白地說明他「胡譜」的差異，一、他只作記述，不作議論與批評；二、他多引用譜主自述，不引用太多論文；三、他不打算獨立出書，只打算作為《章實齋遺著》的附錄；四、「胡譜」遺漏或錯誤，都在「姚譜」中改正<sup>86</sup>。可知他對於「胡譜」引進批評一事十分保留。

<sup>80</sup> 朱文華，〈胡適與中國傳記史學〉，《現代學術史上的胡適》（北京：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，1993），頁147。余英時認為：胡適不僅希望能在體例上開風氣，也認為中國的傳記文學不如歐洲完備。參余英時，〈年譜學與現代的傳記觀念〉，《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》（台北：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，1984），頁95。

<sup>81</sup> 「胡譜」版權頁，參胡適，《章實齋先生年譜》（上海：商務印書館，1922），版權頁。

<sup>82</sup> 內藤湖南，〈胡適之の新著章實齋年譜を讀む〉，頁3。

<sup>83</sup> 張謇的兒子張孝若，在父親去世後想要寫傳留念，第一個就想要使用「胡譜」的新體例，完成後，他也請胡適寫為此書寫了一篇序，在此序中，胡適十分滿意於「胡譜」的勞效。參胡適，〈序〉，《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30），頁1-4。也由於「胡譜」的貢獻，使得後來許多年譜與傳記基本上性質相連了，而傳記寫作時，許多人不可避免地都會提及「胡譜」。

<sup>84</sup> 姚名達，〈姚序〉，《章實齋先生年譜（訂補版）》，頁6。

<sup>85</sup> 姚名達，〈序例〉，《邵念魯年譜》，頁1-4。

<sup>86</sup> 姚名達，〈會稽章實齋先生年譜引言〉，《國學月報》，2：4（北京，1927.4），頁183-184。

### 3. 訂補與人事

「訂補譜」出版後，姚名達在〈序〉言說明他的「訂補條例」，前三條約略是：一、極力尊重原文，除非有新的證據可以改變，否則絕不刪改；二、適之先生解釋章先生的主張，尤其特別尊重，雖然有一、二條和我的意見不同，但我在這增補本裡絕對不說一句話；三、凡適之先生遺漏的、當時尚未發現的史料，我都按年月插補，但並不說明，誰是新補，誰是原文<sup>87</sup>。這便是吳天任所疑惑的：姚名達為何要如此大費周章？而且為何「姚譜」中許多事蹟年月，都與「訂補譜」不合呢？如果在「姚譜」〈引言〉中已經明言，改正了「胡譜」，哪又如何會發生上述這種奇怪的現象呢？若要理解，或許得從姚名達為胡適訂補的人事歷程下手。

據姚名達的記述，他是在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日，第一次見到胡適，當時他跟胡適說，已經使用劉刻本《章氏遺書》為「胡譜」訂補了一些新史料，胡適則請他拿一本全新的「胡譜」，補好後再寄給他。但姚名達並沒有即刻履約，因為胡適休假一年，七月啓程前往歐洲去了<sup>88</sup>。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，王國維投湖，姚名達藉由整理遺著的機會，廣泛閱讀王氏著述，注意到了「版本」的重要，遂投入於各種章氏遺著版本的校勘，找遍了北京，居然找不到任何「章氏遺書」的鈔本，使得他的〈章實齋著述考〉考到《文史通義》時只能擱筆<sup>89</sup>。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，在胡適主持上海吳淞中國公學任教的陸侃如，從上海回到北京，跟昔日清華老友姚名達談天，說到「胡譜」即將改版事<sup>90</sup>。姚名達想起他與胡適在一九二六年六月的約定，決定趕快趁時間補完。他曾在十二月三十日致信胡適，說會在最快的時間內完成訂補事，另談及陸侃如希望他能一

<sup>87</sup> 姚名達，〈姚序〉，《章實齋先生年譜(訂補版)》，頁 7-8。

<sup>88</sup> 胡適 1926 年 7 月中赴歐，一直到 1927 年 5 月中返國。胡頌平(編)，《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》，第 2 冊(台北：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，1984)，頁 642；679。

<sup>89</sup> 姚名達，〈姚序〉，《章實齋先生年譜(訂補版)》，頁 4。

<sup>90</sup> 陸侃如曾遊走於北大中文系與清華國學院，當時因和姚名達組「述學社」而認識，後又更進一步地聯合創辦了《國學月報》。陸氏是團體主幹，任編輯部主任，姚氏是其部中的組員，可知其交友關係。參述學社(編)，《國學月報彙刊(第一集)》(北京：樸社，1928)。廣告頁面載有述學社成員表。

起南下，替任商務印書館「國學基本叢書」的主幹，由於一月起叢書工程就即將展開，希望胡適能答應盡快向王雲五推薦。對於此要求，姚名達感到「臉有點紅」，但清華國學院正處於風暴中，希望能與好友一起到上海工作，姚名達仍直言：「總覺得找職業是應該的，何必人薦為是而自薦為非呢？先生，請諒解吧<sup>91</sup>！」姚名達很快地就將「胡譜」原文中錯漏的地方刪除，直接將增補插進去，不過陸侃如卻認為這樣不免有「滅裂魯莽的嫌疑」，十分不妥，要求他另鈔為一小冊，寄給胡適自己動手<sup>92</sup>。

姚名達終沒能前往上海，對於他而言，「人情世故」與「學術實踐」，應被整體地看待。小冊子已經寄給胡適了，遲遲無音訊，只好繼續寄心於訪查「版本」。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三日，他寫信給曾因籌刻「章氏遺書」而沒能先借〈目錄〉給胡適的劉承幹<sup>93</sup>，詢問章學誠未刊遺著《紀年經緯攷》相關事情，大膽地要求劉氏能將「凡例、目錄及本文之前五頁，付郵辱示」，另求函告「全編本數、卷數、頁數」，倘若《章氏遺書》之外另有所得，也望能告知。不久後，竟然收到劉承幹寄來全份的《紀年經緯攷》二冊。姚名達十分感動，花了許多時間校勘，回信感謝，並附上自己的文章數篇。在給劉氏的信中，姚名達表明著對「內藤譜」與「胡譜」的不滿，認為「或陋或蕪，且多有遺誤」，而對自己撰述的〈章實齋年譜〉與〈章實齋之史學〉等文章，則頗有信心，希望劉氏能代轉張爾田批評，似乎透露著張爾田在姚氏心中的權威地位。在「師長零落、知交淺談，少有督學者」的情況下，姚名達甚至希望劉承幹能夠收容他<sup>94</sup>。一

<sup>91</sup> 姚名達，〈1927年12月30日姚名達致胡適信〉，《胡適遺稿及祕藏書信》，第31冊(合肥：黃山書社，1994)，頁82-86。

<sup>92</sup> 這個姚名達「訂補」歷程的告白，更突顯了青年學子對胡適間的「尊重、仰望」之跡。姚氏的「擅自刪改」，在陸氏「提醒後」或許有「滅裂魯莽的嫌疑」。但在「提醒前」，與胡適尚無親密關係的姚名達會「直接刪改」，是可以理解的。參姚名達，〈姚序〉，《章實齋先生年譜(訂補版)》，頁5。

<sup>93</sup> 依照最近公佈的一九二二年七月十二日胡適致劉承幹的信，可以得知，劉承幹雖然未能在刊刻前出借〈目錄〉給胡適，但一出版，劉承幹便馬上寄贈一部給胡適。參梁穎(編)，〈梁啓超、胡適致劉承幹〉，《歷史文獻》，第四輯(上海：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，2001)，頁76-77。

<sup>94</sup> 姚名達在這年間與劉承幹通信往返五通，其中有兩通，不斷希望將自撰文章轉呈張爾田指正。參梁穎(整理)，〈王大隆、姚名達致劉承幹手札〉，《歷史文獻》，第五輯(上海：上海科學技

九二八年八、九兩月，姚名達花了許多金錢，渡海到日本，南遊浙江，只為訪查版本。一九二八年九月十九日，才又再次與胡適碰面(這是一九二六年來的再次碰面)，胡適說小本子收到了，但沒有時間完成，還是請你完成好了，當天敲定了體例<sup>95</sup>。姚名達花了兩週完成了「訂補譜」，一九二九年十月底，〈何序〉與〈姚序〉也寫好，但一直延宕到一九三一年底才出版。其間，姚名達於一九三一年八月四日，還會特別寫信給胡適，希望他能利用最新的想法，再寫一篇「新的長序<sup>96</sup>」。最終，胡適還是選擇放上「舊序」，讓時間停留在一九二二年一月。

## 五、結 論

本文雖然探討了近代中國域內第一本《章學誠年譜》的問世歷程及其後史發展，不過，對於了解整體的中國「現代學術」的興起，仍只是滄海一粟。一九二〇年青木正兒，因深感日本從未能真正發生偉大的思想革命，特別欣賞胡適。與其說是欣賞，不如說是羨慕。青木一開始與胡適通信，就不斷地推崇其作為，胡適不但沒有得意，反而嚴肅起來，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十一日他對青木自承：因為能力薄弱，「恐怕破壞有餘，而建設不足<sup>97</sup>！」這不僅是一種自謙的說法，更是呈現胡適憂心無法掌握未來的坦白。不久後，一九二一年五月十三日，北大同事吳虞向胡適詢問國文教學法，他十分自信地說：「總以思想及能引起多數學生研究之興味為主。吾輩建設雖不足，搗亂總有餘<sup>98</sup>」。表面上，

---

術文獻出版社，2001），頁 92-93。共收入時間密集五函，原無繫年，今據函中線索考訂為 1928 年：1.第二函中「靜安師慕二閩而投海」，可知為 1927 年 6 月 2 日(王國維去世日)後；2.二函繫日為 5 月 21 日，故當後推一年，為 1928 年。

<sup>95</sup> 姚名達，〈姚序〉，《章實齋先生年譜(訂補版)》，頁 5。

<sup>96</sup> 姚名達，〈1931 年 8 月 4 日姚名達致胡適信〉，《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》，第 31 冊，頁 93-96。

<sup>97</sup> 1920 年 11 月 11 日胡適致青木信，參耿雲志(編)，〈關於胡適與青木正兒的往來書信〉，《胡適研究叢刊(第一輯)》，頁 307。

<sup>98</sup> 中國革命博物館整理，榮孟源審校，《吳虞日記》，上冊(成都：四川人民出版社，1986)，頁 599。

這當是兩種不同的說法。然而，究竟面對「現代」發展，胡適產生了什麼樣的行動藍圖呢？而在實踐中，他又遇到了什麼現實狀況呢？如何應對進退呢？在這些問題下，以上的兩種不同的說法，都不能脫離其身處的現實環境來認識。而胡適撰寫《章實齋先生年譜》的脈絡，恰恰印證了上述的辯證。「訂補譜」於一九三一年出版後，過了近十七年，一位名叫姚敬存的青年學子寫了封信給胡適，對他的《章學誠先生年譜》提出了兩點質疑。當時胡適雖掌北大，公務繁忙，但仍很快地就回了信，明確地告訴姚敬存，質疑的部分都是姚名達的誤改，強調他看的版本是署胡適和姚名達兩人之名的「訂補譜」，另有一本是「只用我一人的姓名」的原版<sup>99</sup>。而本文從「胡譜」到「姚譜」的發展分析，更意識到，人與人的交往，在互相影響，互相訂補下，所形成的現實複雜性。而胡適撰述《章實齋先生年譜》及其後史發展，所體現的「現代學術」，便是在一種全新的，由機構、刊物、出版、跨國界所架構的交流方式中產生。在這種運作方式中，特別強調的是交互往返的「訂補」行動。而透過還原運作交流的過程，更能貼近殘留在「書」中的「人」之身影。

另外，在初步解決這些問題後，遂也產生了一個值得玩味的問題：為什麼是「章學誠」呢？在姚名達「國人始知」的見證下，可以知道這是內藤與胡適這兩位中日學界明星，在當時興起的「現代學術」網絡中引發的效應。不過，吳天任「大言不慚」的批評，亦非空穴來風。那到底章學誠值不值得後人一直不斷推崇呢？何炳松在為「訂補譜」寫的〈序言〉末尾，就明言提醒不要過份推崇，他的理由是擔心當時民族主義的影響，會始得過份興盛的章學研究，流入以「國學」作為保護傘的腐化道路上；而且容易使讀者看不起西方史家<sup>100</sup>。何炳松之所以如此說，並無意刻意貶低中學，提高西學<sup>101</sup>。他的觀察某種程度

<sup>99</sup> 原函為繫年為：1948年5月24日姚敬存致胡適；1948年5月31日胡適致姚敬存。1948年6月12日兩函合刊於胡適主編的《申報·文史》第27期。參〈更正《章實齋年譜》的錯誤〉，《申報·文史》（上海），1920年5月24日，第2張第7頁。

<sup>100</sup> 何炳松，〈何序〉，《章實齋先生年譜（訂補版）》，頁25-26。

<sup>101</sup> 何炳松認為若跟章學誠的學說相比，德國 Herder、Hegel 和英國 Buckle 等的見解實在是太膚淺了，太沒有根據。參何炳松，〈何序〉，《章實齋先生年譜（訂補版）》，頁21。

上也符合實情。不過他所說的卻根本地反映出了一個事實，就是他與胡適都是在美國學習了西方史學，回國後才發現了章學誠的意義<sup>102</sup>。根據美國學者傅佛果(Joshua A. Fogel 1950-)的研究，他發現章學誠研究是現代中日學界重新發現中國過去的行動之一<sup>103</sup>。然而這種發現多少也與西方史學的影響不無關係。內藤堪稱日本學界推動章學研究的先驅，不過他似乎十分關注這個問題。他晚年對學生授課時曾特別強調：「今日，章學誠的學問大放光彩，尤其是受過新式西洋教育的人，更加尊重他<sup>104</sup>」。晚年的內藤仍對中日境內各種章學研究瞭若指掌<sup>105</sup>，從一九〇二年得讀章氏著作開始，到後來一九一九年無意間購得遺書稿本，撰述年譜，不過現在他卻反而勸告學生們：「不必要特別鼓吹章氏學問，因為能瞭解其真意者少<sup>106</sup>」。與何炳松不同的是，內藤的反對似乎是針對著西方的影響而來。他曾說，從一九〇二年以來日本大學裡就頗有人鼓吹；而中國，他特別著重於胡適對新式學者們的影響，使得章氏學問的真意，在許多學過西方學問的學者承認下，逐漸獲得普遍認識。其實內藤並沒有指出任何從西方比附章學的錯誤，不過他陳指的現象亦非杜撰。而他之所以特別向學生們陳述這些情形，主要是欲向京都大學研治中國學的學生們暗示治學方法：務必注意西

<sup>102</sup> 除了何炳松曾以西洋史家學說來發現章學誠外，胡適在 1922 年「胡譜」中也有以「西洋史學書」來比附的痕跡，他在乾隆五十七年條下，引了一大段章學誠〈書教〉文字後，加入批評說：「這個主張，在我們今日見慣了西洋史學書的人來看，固然不算新奇；但在當時，這確是一個很新奇的見解」。參胡適，《章實齋先生年譜》，頁 71。

<sup>103</sup> Joshua A. Fogel, "On the 'Rediscovery of the Chinese Past': Ts'ui Shu and Related Cases," *Perpectives on a Changing China: Essays in Honor of Professor C. Martin Wilbur on the Occasion of His Retirement*, ed. By Joshua A. Fogel & William T. Rowe (Boulder: Westview Press, 1979), pp. 219-235. 傅氏另有一本研究內藤的專書，其中亦有部分談及章學誠研究，參 Joshua A. Fogel, *Politics and Sinology: The Case of Naitō Konan (1886-1934)* (Cambridge, Mass.: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, 1984), pp. 154-162.

<sup>104</sup> 內藤湖南〈章學誠的史學〉原是 1928 年 10 月 6 日在京都大學東洋史課堂的演講，後由門生神田喜一郎與哲嗣內藤乾吉，據學生們的聽課筆記整理而成，收入於《支那史學史》一書作為「附錄」。今據《內藤湖南全集》，第 11 卷，頁 471-483。中譯本有內藤湖南(著)，蘇振申(譯)，〈章學誠的史學〉，《文藝復興月刊》，1:2(台北，1970.2)，頁 18-21。此引文參內藤湖南，〈章學誠的史學〉，《內藤湖南全集》，第 11 卷，頁 472。

<sup>105</sup> 1928 年時，內藤對中國境內新一輩學者(除了胡適外)，姚名達、劉咸炘等人正在研究章學誠，十分清楚。參內藤湖南，〈章學誠的史學〉，《內藤湖南全集》，第 11 卷，頁 472。

<sup>106</sup> 內藤湖南，〈章學誠的史學〉，《內藤湖南全集》，第 11 卷，頁 472。

方學問對理解中國原有學問的影響。從一九〇二年後，日本逐漸有鼓吹章氏學問的情形看，當時許多往來其中的中國學人，也參與其中，明顯的例子是：劉師培(1884-1920)、章太炎(1869-1936)與黃侃(1886-1935)諸人。一九〇五年在上海創刊的新式刊物《國粹學報》，也開始推廣章氏學問<sup>107</sup>。而從一九〇〇開始，劉章諸人在日本得讀大量西學日譯本，著作中遂有大量以西學比附中學的文字出現。《國粹學報》當時推動所謂的「古學復興」，背地裡實是借鑑於西學來理解中學；而劉章諸人對章氏學問的注意，多少也跟環境中西學的影響有關。據此，始能從另一個脈絡瞭解章學誠在現代中日學界興起的原因。而章太炎在民國建立後，修訂著作，最有名的例子，就是將《煇書》改為《檢論》，其中也對相關著述引用的部分進行刪改<sup>108</sup>。突顯出他正在從「以西學理解中學的問題」中轉向「力除西學的影響來理解中學」。後來，章氏門人黃侃對此亦有相關的治學說法，如：「治中國學問，應置身於五口通商之前<sup>109</sup>」、「治中國學問，當接收新材料，不接收新理論<sup>110</sup>」，皆是。

<sup>107</sup> 《國粹學報》從 1905 年第 1 年第 6 號開始刊載第一篇章學誠遺文〈任幼植別傳〉，文後，編輯劉師培親更自撰寫了一篇〈跋章實齋任幼植別傳〉。爾後陸續不定時有章氏遺文、閱後跋語或相關訊息的刊載，其中更以 1910 年刊載的頻率最多。

<sup>108</sup> 章太炎《煇書》重訂本於 1904 年在東京出版，增寫了初刻本沒有的〈清儒〉一文，在「六藝，史也。上古以史為天官，其記錄有近於神話」一句的註解中，章太炎引用了許多西書，如：《宗教學概論》、猶太《列王紀略》、《民數紀略》、印度之《富蘭那》，更下案語：「此則古史多出神官，中外一也。人言六經皆史，未知古史皆經也」。參章太炎(著)，朱維錚(編校)，〈清儒〉，《煇書 初刻本 重訂本》(北京：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，1998)，頁 165。所謂「人言」，周予同(主編)，《中國歷史文選(下)》，注為「章學誠」。周予同更認為正文的「六藝，史也」便是章學誠的「六經皆史」的用法。參周予同(主編)，《中國歷史文選(下)》(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)，頁 331-332。從「未知古史皆經」一語上，可知章太炎對「六經皆史」一句，有自己的不同解釋與用法，但其關注章學誠學說的狀況，甚明。民國後，章氏又改編《煇書》為《檢論》，修改此句，並刪除註解全文。參章太炎，〈清儒〉，《檢論》，卷 4(杭州：浙江圖書館，1919，章氏叢書本)，頁 22。

<sup>109</sup> 黃侃(講)，黃焯(記)，〈黃先生語錄〉，《量守廬學記續編》(北京：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，2006)，頁 4。

<sup>110</sup> 黃侃(講)，黃焯(記)，〈黃先生語錄〉，《量守廬學記續編》，頁 4。